

論漢代「四始」中〈鹿鳴〉的美與刺*

黃羽璿

國立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提 要

本文旨在闡究漢世〈鹿鳴〉詩說之美刺不同，論其「為〈小雅〉始」之雙重義涵，從而重新詮釋《史記·孔子世家》之「四始」。首先分別《詩序》與《史記》言四「始」之差異，認為毛鄭遠承孔子，看重居「始」者之教化意義，惟「正」者能當，乃價值取向之排列；司馬遷則基於一種歷史意識，以「始」為事件之起點，取其陳述現象義，乃次序取向之排列。進言〈鹿鳴〉之美刺，蓋即取決於兩造持義不同，毛鄭必以「禮燕臣下」為旨，一應孔子「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說，乃端正上下之原，故以美詩為始；司馬遷則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著眼詩之本事，殆指周衰趨敗，乃亂世之發端，故以刺詩為始。是得言「〈鹿鳴〉為〈小雅〉始」之雙重義涵：詩在毛鄭則美善大備，為君臣楷模、教化之原，大其價值而為始；而司馬遷既以刺詩定調，衰周為始，〈鹿鳴〉以下便無復稱美，故云「〈小雅〉怨誹而不亂」，篇無正詩矣。從而可知〈孔子世家〉所載：「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殆有兩解：言者孔子，則四詩必美，居始

* 本文蒙楊晉龍老師與《淡江中文學報》兩位匿名審查老師不吝指正與鼓勵，謹致由衷之謝忱。

皆正，顯其人倫教化義；言者史遷，則美刺並陳，居始者蓋為發端，以是詩之質性引領全篇，故美刺不拘，但以次序列之。本文憑〈鹿鳴〉之美刺，抉發「四始說」之兩端詮解，所論關涉漢代《詩經》學暨四始之研究，為其價值所在。

關鍵詞：〈鹿鳴〉 四始 司馬遷 孔子 〈小雅〉

論漢代「四始」中〈鹿鳴〉的美與刺

一、前言

《詩》有「四始」，說出兩端，蓋首見於《詩序》與《史記》。〈詩大序〉云：

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①

乃以「〈風〉、〈小雅〉、〈大雅〉、〈頌〉」為《詩》之四始。而明舉詩篇屬之者，則出於《史記·孔子世家》：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②

「故曰」一段提出「〈關雎〉、〈鹿鳴〉、〈文王〉、〈清廟〉」四詩為四始之

① （漢）毛亨傳，（漢）鄭玄（字康成，127-200）箋，（唐）孔穎達（字沖遠，574-648）等正義：《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本），卷1之1〈關雎·序〉，頁16、18-19。

② （漢）司馬遷（字子長，145-86 B.C.）：《史記》第3冊（臺北：鼎文書局，2002年，影印中華書局點校本），卷47〈孔子世家〉，頁1936。

說，惟創說者竟係孔子（丘，551-479 B.C.）抑或司馬遷，似仍闇昧難明，亦未見有疑者。^③匡衡（字稚圭，建始中 [32-29 B.C.] 免為庶人）嘗云：「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④張超（字子並，靈帝時人）有賦：「感彼〈關雎〉，性不雙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⑤《漢書·儒林傳》亦載：「（孔子）論《詩》則首〈周南〉」，^⑥顏師古（籀，581-645）注曰：「以〈關雎〉為始也」，^⑦皆以《史記》中之四始說出自孔子，如此，司馬遷便單純為一轉述者。然魏源（字默深，1794-1857）嘗論四始云：

請先以《魯詩》之義明之，司馬遷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烏乎何書不有發端？體例奚關大義？蓋嘗深求其故，而知皆三篇連奏，皆上下通用之詩，皆周公述文王之德，皆夫子所特定，義至深，道至大也。^⑧

言下之意，蓋以司馬遷為立說者，並屬之於《魯詩》，^⑨惟其後復云「皆夫子所特

③ 按：稍有觸及者，如孫蓉蓉（1953-）謂：「《魯詩》的『四始』說見於《史記·孔子世家》，其曰：『古者《詩》三千餘篇，……（中略）。』這裡所謂的『四始』說，司馬遷並未明指是《魯詩》的『故曰』，但一般認為司馬遷《史記》中的引詩說詩，都是屬於《魯詩》一派。」見氏撰：〈「四始」說考論〉，《齊魯學刊》2005年第6期（總第189期），頁65。雖意識到「故曰」的發言者問題，卻逕歸其於《魯詩》，未有進一步的判別。

④ （漢）班固（字孟堅，32-92）：《漢書》第4冊（臺北：鼎文書局，1997年，影印中華書局點校本），卷81〈匡張孔馬傳·匡衡〉，頁3342。

⑤ （漢）張超：〈誚青衣賦〉，（宋）章樵（字升道，?-1235）註：《古文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四庫全書》影印文淵閣本），卷6〈賦〉，頁624。

⑥ （漢）班固：《漢書》，第5冊，卷88〈儒林傳〉，頁3589。

⑦ 同前註，頁3591。

⑧ （清）魏源：《詩古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道光刻本），上編之2〈通論四始·四始義例篇一〉，頁46。

⑨ 按：學者多以司馬遷之說為《魯詩》，蓋承陳壽祺（字恭甫，1771-1834）、陳喬樞（字樸園，1809-1869）父子觀點而來。《三家詩遺說攷》云：「孔安國從申公受《詩》，為博士，至臨淮太守，見《史記·儒林傳》。太史公嘗從孔安國問業，所習當為《魯詩》，觀其傳儒林，首列申公；敘申公弟子，首數孔安國。此太史公尊其師，〈傳〉故特先之。」見（清）陳壽祺

定」，似又歸本於孔子，令人莫衷一是。^⑩實則分別孔子、司馬遷之必要在於，兩人對〈鹿鳴〉的美、刺認知有別，而這種差異將造成四始說的不同詮解。《孔叢子》嘗載：「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⑪稱許〈鹿鳴〉

撰，（清）陳喬樞述：《三家詩遺說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刻左海續集本），卷1〈魯詩遺說攷·序〉，頁43。惟司馬遷雖問業於孔安國（字子國，武、昭時人），所學乃《書》，而未言學《詩》。其傳儒林，首列申公，蓋因年齒；敘申公弟子，首數安國，亦因入門先後，並非尊師而先之。據此謂《史記》論《詩》皆《魯》說，似言之太過。且史遷家本齊學，就淵源論，豈不亦得謂其說為《齊詩》歟？是本文但舉說者，不特選分家派。又魏源《魯詩》云云，賀廣如亦斥曰：「觀默深之意，由於史遷受自《魯詩》，故『四始』說的根源，便應是來自《魯詩》。此處實大有問題，因為史遷僅標舉四部首章以示其要，但卻從未提及『四始』二字；其次，史遷亦不曾言明四部首章必三篇連屬以合樂。……不能將此歸於史遷，更不能因此而以此說來自《魯詩》。」見氏撰：《魏默深思想探究——以傳統經典的詮說為討論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9年），第4章〈中期思想（1824~1840）〉，頁107。

^⑩ 按：陳桐生（1955-）所論四始諸文，立場大抵同此，一方面承認司馬遷用《魯》說而言四始，一方面又以為四始乃孔子所立。見氏撰：〈論司馬遷的《詩》學批評觀〉，《淮陰師範學院學報》第21卷第3期（1999年），頁107-110、〈從《魯詩》「四始說」到《毛詩序》〉，收入《第四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年），頁294-301、〈論「四始」——經學與中國古代文論範疇系列研究之一〉，《孔孟月刊》第39卷第5期（2001年1月），頁1-12。

^⑪ 題（漢）孔鮒（字子魚，264-208 B.C.）撰，（宋）宋咸（字貫之，995-?）注：《孔叢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上海圖書館藏宋刻本），卷1〈記義〉，頁710。按：關於《孔叢子》的文獻性質暨其來源問題，虞萬里（1956-）認為：「《孔叢子》一書，清以來多認為偽書。筆者以為著一『叢』字，足見其匯集文獻之旨意，故其中多有先秦諸子之史料。」見氏撰：《上海館藏楚竹書《緇衣》綜合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7章〈《緇衣》正文與孔子之關係〉，頁284。早前的黃懷信（1951-）即嘗比對先秦典籍印證此一觀點，並云：「有關孔子的各種紀錄，在先秦及秦漢的各種典籍中是普遍存在的。《孔叢子》前四篇有關孔子之事，有的在這些典籍中即可看到。……今四篇中文字既不晚於《大傳》，至少說明在漢以前已有與四篇相同的材料存在。……其文字基本上屬於採輯舊材料或據舊材料加工而成。」見氏撰：〈《孔叢子》的時代與作者〉，收入黃懷信、李景明（1951-）主編：《儒家文獻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頁320、321、324。後孫少華（1972-）亦循相同路徑指出《孔叢子》與《論語》、《孟子》、《荀子》、《墨子》、《管子》、《韓非子》等書之重出，證明其與先秦文獻取材之「共有性」（參氏撰：《孔叢

表現了君臣上下之以禮相待；然司馬遷卻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¹²反以〈鹿鳴〉刺時之仁義趨敗。一美一刺，各立極端。後鄭玄箋《詩》，於《詩譜·序》云：「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¹³以〈鹿鳴〉爲文、武盛時之詩，¹⁴亦與太史公意見相左。要之，從孔子到司馬遷而鄭玄，可知下至兩漢，說〈鹿鳴〉者意猶歧出，甚且對立。故本文即準此而發，試圖釐清是詩在漢世的不同詮釋，進而揭其所引發的「四始說」解讀問題。首先分別漢人對「始」的內涵認知，次述〈鹿鳴〉的兩端詮釋，終論「四始」的可能理解。惟須說明的是，本文乃著眼於〈鹿鳴〉在漢世的不同詮解及其所代表的意義，而非詩旨之闡釋，¹⁵故不涉及歷來諸家詮釋該詩的評價問題。

子》與秦漢子書學術傳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第1章〈《孔叢子》與先秦子書的學術傳統〉，頁4-79），是書中所錄，非盡向壁虛造可知也。另虞萬里亦嘗針對清人的「偽書」指控云：「《家語》和《孔叢子》之偽，僅是清儒崇鄭玄鄙王肅風氣下之集體觀念，原未經科學方法證明，且今因出土文獻之啟示，《家語》、《孔叢子》真偽又被重新審視，並非一定偽書。」見氏撰：〈以丁晏《尚書餘論》為中心看王肅偽造《古文尚書傳》說——從肯定要否定後之思考〉，《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7期（2010年9月），頁146。

¹²（漢）司馬遷：《史記》第1冊，卷14〈十二諸侯年表〉，頁509。

¹³（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詩譜序〉，頁5。

¹⁴按：劉操南（1917-1998）則認為〈鹿鳴〉當成王時作，其言曰：「文王之時是否已有諸侯鄰國之事，可能有些問題，諒是成王之世，周公制禮作樂，將〈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篇列為升歌，後賢有所增加與美化。」見氏撰：〈《詩·小雅·鹿鳴》三篇闡義〉，《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第2期（1991年3月），頁15。

¹⁵按：關於〈鹿鳴〉詩旨暨詩義之闡述，可參趙璧光：〈小雅興義述——鹿鳴之什興四篇〉（見《孔孟學報》第35期〔1978年4月〕，頁115-133）、黃瑞云（1932-）：〈鹿鳴之什詩義管窺〉（見《湖北師範學院學報》1985年第1期，頁58-63、70）、王禮卿（1908-1997）：〈詩小雅鹿鳴之什指釋（上）〉（見《孔孟學報》第57期〔1989年3月〕，頁1-44）、劉操南：〈《詩·小雅·鹿鳴》三篇闡義〉（見《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第2期〔1991年3月〕，頁14-18）、張祝平（1955-）：〈鹿鳴、鹿鳴宴、鹿鳴館——《鹿鳴》的闡釋與文化影響〉（見《孔孟月刊》第40卷第9期〔2002年5月〕，頁12-18）、鄧慶紅（1982-）：〈《詩經·小雅·鹿鳴》的主題及成詩時間〉（見《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4卷第3期〔2005年〕，頁63-66）等文。他如李樹軍（1974-）：〈鹿鳴考〉（見《山東教育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頁86-87、90）、岳泓（1969-）：〈破解《詩經·小雅·鹿鳴》詩的上古禮樂文化信息之謎〉（見《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8卷第3期〔2005年5月〕，頁120-123）則著重在〈鹿鳴〉與禮樂儀式之關係。

二、《詩序》、《史記》所謂四「始」

《詩序》以「〈風〉、〈小雅〉、〈大雅〉、〈頌〉」爲「四始」，其對「始」的定義，蓋可由言〈關雎〉中得見，曰：「〈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¹⁶「〈風〉之始也」雖含有「次序排列」之意，更要者卻在於其有「正夫婦」之功，故謂「風，風也，教也。」可知「風」之爲「始」，主要內涵乃在「教」，是一種「價值排列」的意義。是以《詩序》用「詩之至也」歸結之，而不言「詩之次也」。鄭玄蓋本此意而云：「始者，王道興衰之所由」，¹⁷並彰顯此中的「正」、「變」加以發揮，《詩譜·序》曰：

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大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由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教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眾國紛然，刺怨相尋，……故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¹⁸

《詩序》於「〈變風〉、〈變雅〉」但言「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¹⁹鄭玄則逕以懿王而下屬之，與文、武時之〈正風〉、〈正雅〉相對。

¹⁶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卷1之1〈關雎·序〉，頁12。

¹⁷ 同前註，卷1之1〈關雎〉，頁19。

¹⁸ 同前註，〈詩譜序〉，頁5-6。

¹⁹ 同前註，卷1之1〈關雎·序〉，頁16。

結合《詩序》的「四始說」，知康成乃特別強調此中的「正變觀」，並為其劃分時代；至於劃分標準，便在「政教之興衰」，所以就其立場言，「始」者惟「正」者居焉，其內涵仍是一種價值取向的意義。²⁰

至於〈孔子世家〉所錄「四始」，文曰：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²¹

這段記載的關鍵在「始於衽席」一句，若「故曰」云云乃孔子之意，則此句蓋指「作」詩從卧席起，故從〈關雎〉、〈鹿鳴〉到〈文王〉、〈清廟〉，乃由「人際」發端，進至「天人之際」，此意魏源申之甚明：

故〈關雎〉之三，本后妃房中之歌，而鄉樂之亂必及之。〈鹿鳴〉之三，本燕勞臣下之樂，而鄉飲酒禮及大學釋菜亦歌之。則政自閨門行乎朝廷，而達乎鄉黨邦國矣。〈文王〉之三，皆言王天下之事，而兩君相見亦用之。〈清廟〉之三，乃宗祀配帝之樂，……則政又本乎君親，而洽乎上下，通乎幽明矣。²²

〈關雎〉、〈鹿鳴〉乃自閨門而朝廷、鄉黨向外延伸，〈文王〉、〈清廟〉則又

²⁰ 按：匡衡嘗謂：「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見（漢）班固：《漢書》第4冊，卷81〈匡張孔馬傳·匡衡〉，頁3340。其以「原情性而明人倫」解〈風〉之為始，即是用《詩序》之「價值排列」義。

²¹ （漢）司馬遷：《史記》第3冊，卷47〈孔子世家〉，頁1936。

²² （清）魏源：《詩古微》，上編之2〈通論四始·四始義例篇一〉，頁46-47。

交通上下，以貫幽明之變。²³惟其爲人倫之發端，故四詩必當美善大備，是以孔子稱〈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以色喻於禮」；²⁴美〈鹿鳴〉「見君臣之有禮」。此意從《韓詩外傳》亦能得見，文載：

子夏問曰：「〈關雎〉何以為〈國風〉始也？」孔子曰：「〈關雎〉至矣乎！夫〈關雎〉之人，仰則天，俯則地，幽幽冥冥，德之所藏，紛紛沸沸，道之所行，雖神龍化，斐斐文章。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夫六經之策，皆歸論汲汲，蓋取之乎〈關雎〉。〈關雎〉之事大矣哉！馮馮翊翊，自東自西，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子其勉強之，思服之。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嘆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地。」《詩》曰：「鐘鼓樂之。」²⁵

孔子認為〈關雎〉之道，乃「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故稱其「至」；是〈關雎〉之爲始，不因編次之偶然，乃爲價值之必然。故就孔子言，「始」之「居

²³ 按：李銳（1977-）又另指出：「〈關雎〉、〈鹿鳴〉、〈文王〉、〈清廟〉這4首詩討論的主要是夫婦、父子、君臣、天人四種關係，……將這四首詩放置在〈風〉、〈小雅〉、〈大雅〉、〈頌〉的首篇，作為《詩經》的『四始』，這種安排應該與孔子的禮學思想有著密切關係。編訂者即使不是孔子本人，也當是孔子的弟子循孔子之意而為之。」見氏撰：〈「四始」新證〉，《孔子研究》2004年第2期，頁45。認為四詩列首，蓋本孔門之教，並非單純的次序排列。王志近此意而謂：「竊以為斯四始也，蓋欲以〈關雎〉明婚姻之禮；以〈鹿鳴〉明君臣之禮；以〈文王〉明事天之禮；以〈清廟〉明祭祖之禮。孔子之所以居〈關雎〉為『四始』之首者，主要在於〈關雎〉所明男女婚禮姻之禮在『四始』所明之禮中地位最為重要。」見氏撰：〈上博簡《孔子詩論》與《詩》經成書考〉，《湖鵝月刊》第29卷第11期（2004年5月），頁37。認為四詩乃本禮而制。要之，皆同意「始」者，實蘊涵「教化」之意；故「居始」者，即為「教化之原」。

²⁴ 見馬承源（1927-2004）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孔子詩論〉第10簡，頁139。

²⁵ （漢）韓嬰（200?-130? B.C.）撰，許維通（1905-1951）校釋：《韓詩外傳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卷5〈第一章〉，頁164。

首」，其要在能化育眾庶，方得稱王道之「原」。²⁶前述《傳》、《箋》以始為「至」、以始為「正」之說當即遠承於此，皆看重「價值排列」甚於「次序排列」。²⁷

另一方面，〈孔子世家〉中「四始」的立說者若為司馬遷，則「始於衽席」強調的便是「次」詩從卧席起，即〈關雎〉、〈鹿鳴〉、〈文王〉、〈清廟〉為四始，蓋因其居〈風〉、〈小雅〉、〈大雅〉、〈頌〉之首，²⁸至於詩之「美刺」、「正變」，則不在考量範圍。故司馬遷又云：「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²⁹「周室衰而〈關雎〉作」，³⁰以〈關雎〉之作肇因於周道有缺，而周道之缺又起於衽席，則太史公所謂「『始』於衽席」者，其內涵蓋為「起點」義，即指歷史事件的開端；換言之，其言「始」乃就「陳述現象」言，故指向「次

²⁶ 按：《韓詩外傳》所載孔子此意，匡衡亦嘗述及：「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見（漢）班固：《漢書》第4冊，卷81〈匡張孔馬傳·匡衡〉，頁3342。以「綱紀之首，王教之端」釋〈關雎〉之為「始」，仍看重其居首之教化價值。

²⁷ 按：柯小剛（1973-）則進一步認為：「何以為始？只是因為它們是四個部分的首篇？可是在〈孔子世家〉言及『四始』的語境裡，《詩經》的目次還有待孔子來編定：『古者詩三千餘篇，……（中略）。』這同樣是在王道政治興衰的問題意識中的史記敘述，……不是因為〈關雎〉、〈鹿鳴〉、〈文王〉、〈清廟〉四篇是風、小雅、大雅、頌的首篇，所以孔子以之為四始，而是因為孔子把這四篇分別編為四個部分的首篇，所以這四篇才是四始之始。」見氏撰：〈《詩經·關雎》大義發微〉，《江海學刊》2014年第2期，頁13-14。以〈關雎〉四詩居〈風〉、〈小雅〉、〈大雅〉、〈頌〉之首為孔子所定，故必有其價值教化之考量，而非次序編排之偶然。此說殆有取於魏源「而『四始』則又夫子反魯正樂、正〈雅〉、〈頌〉，特取周公述文德者各三篇，冠于四部之首，固全《詩》之裘領，禮樂之綱紀焉」（見氏撰：《詩古微》，上編之2〈通論四始·四始義例篇一〉，頁46）之論，將「四始說」之「發生」轉化為「創生」，使孔子從詮釋者一躍而成創造者，徹底否定了其他可能。

²⁸ 按：劉挺頌（1982-）亦嘗提及「魯詩說著眼於作品編排的次序之始」（見氏撰：〈試析《毛詩正義》對「四始」「六義」的再闡釋〉，《銅仁學院學報》第12卷第2期〔2010年3月〕，頁20）惜僅一語帶過，未有進一步的說明及發揮。

²⁹ （漢）司馬遷：《史記》第1冊，卷14〈十二諸侯年表〉，頁509。

³⁰ 同前註，第4冊，卷121〈儒林列傳〉，頁3115。

序排列」甚於「價值排列」。在此前提下，〈鹿鳴〉自可「處變時」、「爲刺詩」。要之，《傳》、《箋》言「始」，乃合「正變」，故必以「美詩」當之，取教化以喻焉；史遷言「始」，則重「次序」，故不以正變爲限，治亂皆可當。下則以〈鹿鳴〉爲例，申說此意。

三、〈鹿鳴〉的兩端詮解

司馬遷在《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中提到：「太史公讀《春秋曆譜牒》，至周厲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③①}認爲〈鹿鳴〉作於周衰之世，蓋其時仁義趨敗，故用是詩以刺。說以〈關雎〉並〈鹿鳴〉皆因周衰而作，不僅有別於毛鄭以二詩屬文王之世，且〈國風〉、〈小雅〉亦將同時以刺詩始。無獨有偶，其後王符（字節信，85?-162）於《潛夫論·班祿》亦云：「其後忽養賢而〈鹿鳴〉思，背宗族而〈采芣〉怨，履畝稅而〈碩鼠〉作，……故遂耗亂衰弱。及周室微而五伯作，六國弊而暴秦興，……」^{③②}以〈鹿鳴〉之出乃因上不禮賢，故取以爲刺；「思」字即含有「緬懷過往」之意，世殊事異，時衰之至，與〈碩鼠〉並。王說顯與史遷同調，皆用〈鹿鳴〉言刺，而非稱美。另王逸（字叔師，元初中〔114-119〕校書郎）注《楚辭·七諫·謬諫》：「飛鳥號其羣兮，鹿鳴求其友」句時亦謂：「鹿得美草，口甘其味，則其求友而號其侶也。以言在位之臣，不思賢念舊，曾不若鳥獸也。《詩》曰：『嘒其鳴矣，求其友聲。』又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③③}舉〈鹿鳴〉詩句反諷，刺掌權者不顧舊日賢良，意同王符「忽養賢」之旨。爾後又有蔡邕（字伯喈，133-192）續此說而詳實之，《琴操》云：

^{③①} 同前註，第1冊，卷14〈十二諸侯年表〉，頁509。

^{③②} （漢）王符撰，（清）汪繼培（字因可，1775-?）箋，彭鐸（1913-1985）校正：《潛夫論箋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4〈班祿〉，頁168-169。

^{③③} （宋）洪興祖（字慶善，1090-1155）撰，白化文、許德楠、李如鸞、方進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卷13〈七諫章句〉，頁254-255。

〈鹿鳴操〉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傾，留心聲色，內顧妃后，設旨酒嘉肴，不能厚養賢者，盡禮極歡，形見於色。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士幽隱，小人在位，周道陵遲，自以是始。故彈琴以風諫，歌以感之，庶幾可復。歌「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此言禽獸得美甘之食，尚知相呼，傷時在位之人不能。乃援琴以刺之，故曰鹿鳴也。³⁴

仍是扣緊「周道陵遲」此一背景，以在位之君縱情聲色，致使小人得志，賢士隱微，故大臣懷憂，作〈鹿鳴〉，歌以刺之。³⁵據所引諸例可知，司馬遷「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說出後，傳者不輟，後漢猶興。³⁶觀其流衍，此說或於漢世有

³⁴ 引見（宋）李昉（字明遠，925-996）等奉敕撰：《太平御覽》第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578〈樂部·琴中〉，頁373。

³⁵ 按：胡承珙（字景孟，1776-1832）認為以〈鹿鳴〉為刺詩，乃是「陳古諷今」，非以其詩作於衰周。並釋前引《琴操》文曰：「此明是周衰無復〈鹿鳴〉養賢之風，大臣援琴而彈古詩以風耳。詞旨明白，無可疑者。」見氏撰：《毛詩後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續修四庫全書》影印南京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七年〔1837〕求是堂刻本），卷16〈鹿鳴〉，頁356。惟《琴操》先言「周大臣之所作」，後言「昭然獨見周道之陵遲」，可知乃因時而作；且史遷既言「周道缺」而「〈關雎〉作」、「〈鹿鳴〉刺」，顯是作於周衰之意。胡氏蓋以《毛詩》強繩之耳。

³⁶ 按：高誘（建安十七年〔212〕遷河東太守）注《淮南子·詮言訓》：「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卑體婉辭以接之，欲以合歡，爭盈爵之間反生鬪，鬪而相傷，三族結怨，反其所憎，此酒之敗也。《詩》之失僻，樂之失刺，禮之失責」一段之「樂之失刺」句謂：「鄉飲酒之樂，歌〈鹿鳴〉，〈鹿鳴〉之作，君有酒肴，不召其臣，臣怨而刺上者非也。」見劉文典（1889-1958）撰，馮逸、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卷14〈詮言訓〉，頁485。仍沿襲〈鹿鳴〉刺上之基調。或有將「臣怨而刺上者非也」句斷作「臣怨而刺上者，非也」者如王先謙（字益吾，1842-1917），並云：「是雖用《魯》說而意以怨刺為不然。」見氏撰，吳格（1952-）點校：《詩三家義集疏》下冊（臺北：明文書局，1988年），卷14〈鹿鳴〉，頁551。觀〈詮言〉所載：「今有美酒嘉肴以相饗」、「爭盈爵之間反生鬪」，則高注「君有酒肴，不召其臣，臣怨而刺上者非也」分明連繫諸句，若自「非也」斷開以示己意，似違注疏體例；反之，果如王氏所謂高誘乃以怨刺說為不然，故特於注末揭之，仍得證此說尚傳衍於世。

所受授，³⁷而與毛鄭有別。今將其回置〈孔子世家〉之四始，則〈關雎〉、〈鹿鳴〉之刺好內寵而忽養賢，³⁸即與〈文王〉、〈清廟〉之美文王對。復合前說司馬遷對「始」的認知，不以「價值排列」為取向，故「刺詩」得居「始」焉。

相對於此，漢世言〈鹿鳴〉者歧義猶見，即毛鄭之「正詩說」，可以《詩序》為代表：「〈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³⁹乃以「禮燕臣下」為旨。⁴⁰前論《傳》、《箋》用「始」蓋遠承孔子，今試闡之以〈鹿鳴〉。孔子說〈鹿鳴〉，見於《孔子家語》

³⁷ 按：學者或受陳恭甫父子影響，以為司馬遷習《魯詩》，則此說必《魯》說，實無確證。如匡衡以治《齊詩》名世，〈儒林傳〉所謂「《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者，上疏成帝（驚，51-7 B.C.）則云：「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見（漢）班固：《漢書》第4冊，卷81〈匡張孔馬傳·匡衡〉，頁3342。匡氏此論〈關雎〉分明用《毛》義，因之朱子（熹，1130-1200）尚稱其「善說詩」（見氏集註：《詩經集註》〔臺北：萬卷樓，1996年，仿古字版〕，卷1〈關雎〉，頁1）；說《詩》以〈關雎〉為始，自不同《詩緯》之以〈大明〉、〈四牡〉、〈嘉魚〉、〈鴻雁〉為《齊詩》之四始。同理，司馬遷說《詩》，亦不必即《魯詩》，況其傳承尚且存疑乎！至如陳桐生強解〈鹿鳴〉而牽合申培謂：「惟獨《魯詩》大師申公出於獨特的生命體驗而將〈鹿鳴〉斷為刺詩。……殘酷的事實使申公認識到，統治者今日不能敬賢，明天就有可能發展到害賢、殺賢。因此他認為〈鹿鳴〉的題旨是詩人借自己不被禮遇而諷刺在上位者不能養賢。」見氏撰：〈論「四始」——經學與中國古代文論範疇系列研究之一〉，《孔孟月刊》第39卷第5期（2001年1月），頁7。尤屬無稽。

³⁸ 按：〈關雎〉為刺詩，見前揭《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儒林列傳〉文。此外，《漢書》亦載：「后妃之制，天壽治亂存亡之端也。……禍敗曷常不由女德？是以佩玉晏鳴，〈關雎〉歎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見（漢）班固：《漢書》第3冊，卷60〈杜周傳·杜欽〉，頁2669。認為〈關雎〉因嘆君上好女色而作。

³⁹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卷9之2〈鹿鳴·序〉，頁315。

⁴⁰ 按：《鹽鐵論·刺復》載：「今當世在位者，既無燕昭之下士，〈鹿鳴〉之樂賢」、「招舉賢良、方正、文學之士，超遷官爵，非燕昭之薦士，文王之廣賢也？然而未觀功業所成。殆非龍蛇之才，而〈鹿鳴〉之所樂賢也。」見王利器（1911-1998）校注：《鹽鐵論校注（定本）》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卷2〈刺復〉，頁131-132。以「樂賢」為〈鹿鳴〉題旨，是亦取其「禮燕臣下」之詩意。

與《孔叢子》，《孔子家語·好生》載：

孔子曰：「小辯害義，小言破道，〈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取其雄雌有別；〈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若以鳥獸之名嫌之，固不可行也。」⁴¹

孔子認為人不應執著於枝節表象之言辯，否則將有所蔽而不見道，正如〈關雎〉與〈鹿鳴〉，皆君子所稱美，若囿於其名而舍之，實不可取。從「君子大之」的判斷推求，孔子肯定是詩之正面價值，庶幾可得，此其一也；二者，特揭〈關雎〉、〈鹿鳴〉並論之，其代表性正可與四始說相呼應。再觀《孔叢子》，〈記義〉載：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歎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⁴²

認為〈鹿鳴〉表現了君臣上下以禮相待，可知孔子乃以詩中所云為當時君燕臣下之「實錄」，並無陳古諷今或刺上之意，顯與司馬遷以下等人認知不同。且晚近出土之〈孔子詩論〉（第 23 簡）亦有相應的記載，曰：「〈鹿鳴〉，以樂始而會，以道交見善而效，終乎不厭人。」⁴³周鳳五釋云：

《小雅·鹿鳴》共三章，首章「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篳，承筐是將」，簡文所謂「以樂始」也；次章「君子是則是效」。簡文所謂「以道

⁴¹ （魏）王肅（字子雍，195-256）注：《孔子家語》（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 年，《四部叢刊初編（初印本）》影印上海涵芬樓借江南圖書館藏明翻宋本），卷 2〈好生〉，頁 22。

⁴² 題（漢）孔鮒撰，（宋）宋咸注：《孔叢子》，卷 1〈記義〉，頁 710。

⁴³ 按：簡文從周鳳五（1947-2016）老師釋讀。見氏撰：〈《孔子詩論》新釋文及注解〉，收入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年），頁 155。

交見善而傲」也；卒章「以燕樂嘉賓之心」，簡文所謂「終乎不厭人也」⁴⁴。

認為三句簡文各自代表了〈鹿鳴〉三章之章旨，⁴⁵《孔叢子·記義》之「見君臣之有禮也」恰可總括簡文所示，蓋君設宴以樂始，上下以道交、見賢而效之，終乃君臣盡歡，故可謂有禮也。凡此皆可見孔子對〈鹿鳴〉的解讀，與《詩序》所謂「燕羣臣嘉賓」、「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相應；且〈記義〉既言「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可知孔子蓋以二〈南〉為正詩，則〈關雎〉自不含怨刺衰周之意。

要之，孔子論〈鹿鳴〉果如本文所述，則司馬遷以下解是詩為周衰刺上者，顯悖離孔子意旨；且子長之說並非曇花一現，後漢猶承之不輟。此現象蓋可引發若干思考：（一）漢世論《詩》者不全以孔子為依歸，即言「折中於夫子」者如司馬遷，亦不如是；（二）毛鄭雖承孔子，其詩說卻未因此獨擅，且《箋》行以前，似亦不居主流；（三）就〈鹿鳴〉而言，司馬遷等人的「刺詩說」恰與毛鄭的「正詩說」形成對立的兩種極端。今若用此二說詮釋〈孔子世家〉的「四始」，當得斷言漢世嘗存兩種「四始說」，下試論之。

⁴⁴ 同前註，頁163。

⁴⁵ 按：簡文「以道交見善而效」一句牽涉到第二章「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忮，君子是則是效」之解讀，就詩意觀之，本章可有兩種意思：一、嘉賓即君子，則「君子是則是效」當譯為君子之作為可讓人效法；二、嘉賓自嘉賓，君子泛指有德之人，則「君子是則是效」當譯為嘉賓之作為，可為君子效法。《傳》從前，《箋》從後。考慮簡文「以道交」三字，「交」有相互之意，若從前解，則無對象可與，故當從後解，然猶有可發揮處。《正義》以《序》之羣臣為《經》之嘉賓，是嘉賓即羣臣也，然若嘉賓即羣臣，則「君子是則是效」一句便成空蹈，「君子」亦成虛指。案鄭玄注《儀禮·鄉飲酒禮》「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句云：「〈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脩政之樂歌也。」見（漢）鄭玄注，（唐）賈公彥（永徽中〔650-655〕，官至太學博士）疏：《儀禮注疏》，卷9〈鄉飲酒禮〉，頁92。故本章之嘉賓當指四方之賓，其德音甚明，可為君子效法，君子則指羣臣言。我為國君，在四方之賓面前指示羣臣（君子）應當效法他們。依此解，則簡文之「以道交」既有原來君臣相交之旨，亦得嘉賓與羣臣相交之意。

四、〈孔子世家〉中的兩種「四始說」

《史記·孔子世家》中的四始說若屬司馬遷，用「仁義陵遲」解「〈鹿鳴〉爲〈小雅〉始」，將使〈小雅〉諸詩的詮釋連帶發生影響。案《詩序》有「變雅」之說，鄭玄則進而分別之，認爲〈鹿鳴〉至〈魚麗〉爲文、武之詩，〈南有嘉魚〉至〈菁菁者莪〉爲周公、成王之詩，此十六篇爲〈小雅〉之「正經」，〈六月〉以下即爲「變雅」。⁴⁶今若從史遷說，以〈鹿鳴〉爲周缺之詩，則〈小雅〉將始於康成所謂「變詩」，引領以下諸詩，則通篇無正詩矣。《史記》中雖不得見子長論〈小雅〉他詩，然仍保留若干意見，可窺知一二，如〈司馬相如列傳〉贊曰：「〈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⁴⁷認爲〈大雅〉乃表現上德之周流，〈小雅〉則反映居下之苦以諷上。〈屈原賈生列傳〉亦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⁴⁸蓋以「怨誹」統言〈小雅〉，雖不及亂，然不爲「正詩」可知也。據此得言：在司馬遷的認知解讀中，〈鹿鳴〉做爲〈小雅〉之始，確有引領其下諸詩之意；〈鹿鳴〉刺衰世不得用，推及〈小雅〉他詩，則爲怨苦恨以譏上，主題乃圍繞在君臣之間。惟須說明的是，〈小雅〉言刺，篇無正詩，非創自史遷，其前蓋即有見，《荀子·大略》載：「〈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小雅〉不以於汙上，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⁴⁹以爲作〈小雅〉者，其旨不在驕君，乃在反映政之不明、下之疾苦，故聲甚哀，示民之困也。「不以於汙上」句顯見中無美詩，「其聲有哀焉」則爲刺詩明矣。⁵⁰子長之說，或

⁴⁶ 參（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卷9之1〈小大雅譜〉，頁307-311。

⁴⁷ （漢）司馬遷：《史記》第4冊，卷117〈司馬相如列傳〉，頁3073。

⁴⁸ 同前註，第3冊，卷84〈屈原賈生列傳〉，頁2482。

⁴⁹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卷19〈大略〉，頁511。

⁵⁰ 按：江乾益（1956-2016）另據《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所載：「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

即有取於此，爾後韋昭（字弘嗣，204-273）亦用此意曰：「〈小雅〉之人志狹小，先道己之憂苦，其流乃及上政之得失者」，^{⑤1}與荀卿、史遷意同。此明《史記》說《詩》，當非司馬遷獨意斷之，或前有所承，或有用當時流行者，為漢世解《詩》之一種，殆無可疑。要之，據「仁義陵遲，〈鹿鳴〉刺焉」句，蓋可形塑太史公從〈鹿鳴〉到〈小雅〉乃至「四始」之解讀脈絡：「始」為「次序排列」義引領〈小雅〉諸詩，而居首者正是「以下刺上」之〈鹿鳴〉，確立通篇「怨誹」之基調，亦立其君臣之範圍。韋昭之時猶用此意，可見是說之流布，不為毛鄭所掩。

〈孔子世家〉中的四始說若源自孔子，就其肯定〈鹿鳴〉之正面價值一端言，^{⑤2}司馬遷所代表的解讀便是改變了「四始」的內涵，與孔子原意不同，而毛鄭反成闡揚、恢復孔子之意者。然若從另一角度設想，四始說是否有更早的源頭，此「古義」嘗經孔子導正，後司馬遷等又恢復之。^{⑤3}對此，皮錫瑞（字鹿門，1850-1908）曾提出意見，其於《經學通論·詩經通論·論四始是孔子所定儀禮亦孔子所定解此乃無疑於合樂關雎工歌鹿鳴》曰：

周樂。……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指出荀卿（況，340-245 B.C.）以前，季札已發此說端倪，文曰：「《儀禮·燕禮》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季札所聞，當是此三篇；而其評論之辭，則曰『怨』、曰『周德之衰』云云，可知以〈小雅〉為衰世之詩，其所從來遠矣。」見氏撰：〈鄭玄「風雅正變說」申〈毛詩序〉探論〉，《興大中文學報》第27期（2010年6月），頁71。

^{⑤1} 按：語出《史記集解》〈司馬相如列傳〉贊引。見（漢）司馬遷：《史記》第4冊，卷117〈司馬相如列傳〉，頁3073。

^{⑤2} 按：《左傳》載：「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見（晉）杜預（字元凱，222-284）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卷44〈昭公七年〉，頁766。孔子此引雖是斷章取義，猶見其用〈鹿鳴〉時乃取以嘉許，而非刺怨。

^{⑤3} 按：王先謙認為《史記》所載「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蓋用《魯》說，並曰：「《魯》說最先以為刺詩，乃相傳古訓，即『思初』之義也。」見氏撰，吳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下冊，卷14〈鹿鳴〉，頁551。意指〈鹿鳴〉為刺詩說，當前有所承，故曰「相傳古訓」。

太史公曰：「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關雎〉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是〈關雎〉、〈鹿鳴〉皆出於衰周，非周公作，亦非周公所及見。四始之義，至孔子始定。孔子以為〈關雎〉貞潔慎匹，如匡衡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者，惟文王、太姒足以當之；〈鹿鳴〉、〈四牡〉、〈皇華〉亦惟文王率殷之叛國，足以當之。故推〈關雎〉、〈鹿鳴〉為〈風〉與〈小雅〉之始，以配〈文王〉、〈清廟〉而為四。四始之義，是孔子所定，非周初所有也。⁵⁴

皮氏承認司馬遷之〈關雎〉、〈鹿鳴〉出於衰周說，並同意此乃孔子前即有之「古義」。惟自夫子定〈關雎〉、〈鹿鳴〉、〈文王〉、〈清廟〉為四始後，〈國風〉、〈小雅〉之始即由刺轉美，後世解讀遂多用孔子義，衰周刺時之「古義」則為其所掩。⁵⁵鹿門為周全孔子始定四始說，反認同「刺詩說」在前，而將「〈關雎〉、〈鹿鳴〉為文王詩」看作是孔子發明。⁵⁶其說然否，下試論之。

《左傳·襄公四年》嘗載：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貢問之，

⁵⁴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詩經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7。

⁵⁵ 按：李銳之意同此，其云：「即便『四始』在孔子之前就已經確定，那麼，從上文不難看出，著重從禮義方面來闡發這些詩的思想意義的，正是孔子及其後學，……所以，我們依然可以說，正是孔子及其後學給予了『四始』以思想意義。」見氏撰：〈「四始」新證〉，《孔子研究》2004年第2期，頁45。所謂「新證」，實仍未脫皮氏所論。

⁵⁶ 按：同樣為調合孔子始定四始說及史遷「仁義陵遲」說，魏源則採取不同的策略，其云：「嗚呼！〈關雎〉、〈鹿鳴〉之作，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耶？當文王與紂之時耶？〈關雎〉刺時，所刺何時？豈非思賢妃之淑德，正以傷牝雞之司晨耶？……豈其徒訴于文王哉？其忠告于紂者至矣。……漢儒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二〈南〉二十餘篇，亦可以當殷紂時諫書矣。」見氏撰：《詩古微》，上編之2〈通論四始·四始義例篇四〉，頁52-54。不僅承認〈關雎〉、〈鹿鳴〉為刺詩，且同意二詩作於文王之時；然諷諫之對象卻是紂王，而非文王。此雖得解釋「仁義陵遲」，卻仍無法迴避「周室衰而〈關雎〉作」，固不若皮說機巧。

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⁵⁷

魯穆叔（叔孫豹，?-538 B.C.）使晉，悼公（周，586-558 B.C.）饗禮之，歌至〈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穆叔方拜謝。晉使人問其故，穆叔以〈肆夏〉、〈文王〉諸詩皆非其身分所及，故不敢拜。而〈鹿鳴〉等三詩皆有嘉許使臣意，故三拜謝之。叔孫豹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蓋以其出使晉國，為魯君之代表，故嘉寡君即嘉使臣，乃取「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意，亦有「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意。可知就叔孫豹的理解，〈鹿鳴〉即燕嘉賓之詩。案穆叔使晉在襄公四年（569 B.C.），下距孔子之生尚十八九年，若如皮氏所言，孔子定四始前〈鹿鳴〉乃用以為刺，穆叔豈不知？又豈會發「君所以嘉寡君」之言？且穆叔魯人，是《魯詩》原不以〈鹿鳴〉為刺明矣，《左傳》此載適可駁斥王先謙等古今學者所主張「仁義陵遲，〈鹿鳴〉刺焉」乃司馬遷用《魯》說。從而可知，太史公等說〈鹿鳴〉，即有來源，亦不會早於孔子，且不當為古義。至此得言《史記·孔子世家》所錄「四始」實具雙重內涵：一是孔子解讀下的四詩皆正說，後為毛鄭承傳、發揚，蓋因其解「始」為「正」，乃人倫之發端，故四詩必美，方得顯其教化義涵；同時，亦得有以司馬遷為代表的美刺並陳說，其用「始」則重「次序」，由居首之〈鹿鳴〉引領，確立〈小雅〉怨誹之基調，故以下諸詩皆成刺焉，且是說至漢末猶傳。

⁵⁷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卷 29 〈襄公四年〉，頁 503-505。

五、結語

本文以〈鹿鳴〉一詩為線索，探究漢世在美刺並存的說詩現象背後，所涉及之《詩經》學問題。從〈鹿鳴〉為〈小雅〉始之身份論起，首先分別漢人對「始」字內涵的不同理解；進而綰合〈鹿鳴〉的美刺詮解，辨其各自為「始」的不同意義；復將此種差異置於「四始」的解讀脈絡中，揭其所隱示之雙重內涵。

司馬遷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蓋以周衰而刺詩作。〈鹿鳴〉居〈小雅〉之始而言刺，確立全篇刺上之基調，故云：「〈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則〈鹿鳴〉之為〈小雅〉「始」，殆就現象陳述，指〈鹿鳴〉為〈小雅〉之起點，惟其為刺詩，統領全篇，遂使「怨誹而不亂」成〈小雅〉意旨。

毛鄭說〈鹿鳴〉則不然，以為：「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此殆承孔子「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之評價而來。則〈鹿鳴〉之為〈小雅〉「始」，便不僅指其次序，而兼有稱其價值之意向；「始」者惟「正」者居焉，方能收其教化之功。

〈鹿鳴〉的美刺不同實則牽涉「四始」的雙重詮釋，蓋因司馬遷之作者身份及其說詩立場所致。《史記·孔子世家》所載：「〈關雎〉之亂以為〈風〉始，〈鹿鳴〉為〈小雅〉始，〈文王〉為〈大雅〉始，〈清廟〉為〈頌〉始」一段，若為太史公意，〈鹿鳴〉便以刺詩居首引領〈小雅〉諸詩成怨誹之作；若為太史公轉載孔子意，〈鹿鳴〉則因蘊涵人倫教化義而居〈小雅〉首篇，大其價值之必然。昔論〈孔子世家〉之四始，或謂定於孔子，或謂史遷所說，皆未進一步區分二說所造成的詮釋歧異；甚至意圖調合，既為孔子所定，又為司馬遷用《魯》說，而忽略此中之矛盾。本文則藉〈鹿鳴〉詩說逐一考辨，所論對漢代《詩經》學及「四始」之相關研究，應具有實質的學術價值。

後記：先師周朋齋鳳五先生驟於丙申仙逝，愚雖不才，無緣拜先生門下，惟立志求學，幸得先生引領進門，指點丹頭，哀哉！吾師已遠，悲無由再聞教誨！謹以小文悼念，一表愚之哀思。

徵引書目

一、傳統文獻

- 題（漢）孔鮒撰，（宋）宋咸注：《孔叢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續修四庫全書》第932冊影印上海圖書館藏宋刻本）。
- （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毛詩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本）。
- （漢）韓嬰撰，許維遹校釋：《韓詩外傳集釋》（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漢）司馬遷：《史記》（臺北：鼎文書局，2002年，影印中華書局點校本）。
- （漢）班固：《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97年，影印中華書局點校本）。
- （漢）王符撰，（清）汪繼培箋，彭鐸校正：《潛夫論箋校正》（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儀禮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
《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本）。
- （魏）王肅注：《孔子家語》（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年，《四部叢刊初編（初印本）》第309冊影印上海涵芬樓借江南圖書館藏明翻宋本）。
- （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影印清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本）。
- （宋）李昉等奉敕撰：《太平御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 （宋）洪興祖撰，白化文、許德楠、李如鸞、方進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宋）朱熹集註：《詩經集註》（臺北：萬卷樓，1996年，仿古字版）。
- （宋）章樵註：《古文苑》（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四庫全書》第1332冊影印文淵閣本）。

（清）陳壽祺撰，（清）陳喬樞述：《三家詩遺說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續修四庫全書》第 76 冊影印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刻左海續集本）。

（清）胡承珙：《毛詩後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續修四庫全書》第 67 冊影印南京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七年求是堂刻本）。

（清）魏源：《詩古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年，《續修四庫全書》第 77 冊影印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道光刻本）。

（清）王先謙撰，吳格點校：《詩三家義集疏》（臺北：明文書局，1988 年）。

（清）王先謙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

（清）皮錫瑞：《經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劉文典撰，馮逸、喬華點校：《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王利器校注：《鹽鐵論校注（定本）》（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

二、近人論著

王志：〈上博簡《孔子詩論》與《詩》經成書考〉，《鵝湖月刊》第 29 卷第 11 期（2004 年 5 月），頁 31-38。

王禮卿：〈詩小雅鹿鳴之什旨釋（上）〉，《孔孟學報》第 57 期（1989 年 3 月），頁 1-44。

江乾益：〈鄭玄「風雅正變說」申〈毛詩序〉探論〉，《興大中文學報》第 27 期（2010 年 6 月），頁 67-88。

李銳：〈「四始」新證〉，《孔子研究》2004 年第 2 期，頁 39-45。

李樹軍：〈鹿鳴考〉，《山東教育學院學報》2004 年第 1 期，頁 86-87、90。

周鳳五：〈《孔子詩論》新釋文及注解〉，收入上海大學古代文明研究中心、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編：《上博館藏戰國楚竹書研究》（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 年），頁 152-172。

岳泓：〈破解《詩經·小雅·鹿鳴》詩的上古禮樂文化信息之謎〉，《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8 卷第 3 期（2005 年 5 月），頁 120-123。

柯小剛：〈《詩經·關雎》大義發微〉，《江海學刊》2014 年第 2 期，頁 13-18。

- 孫少華：《〈孔叢子〉與秦漢子書學術傳統》（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5年）。
- 孫蓉蓉：〈「四始」說考論〉，《齊魯學刊》2005年第6期，頁65-70。
-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 張祝平：〈鹿鳴、鹿鳴宴、鹿鳴館——《鹿鳴》的闡釋與文化影響〉，《孔孟月刊》第40卷第9期（2002年5月），頁12-18。
- 陳桐生：〈論司馬遷的《詩》學批評觀〉，《淮陰師範學院學報》第21卷第3期（1999年），頁107-110。
- 陳桐生：〈從《魯詩》「四始說」到《毛詩序》〉，收入《第四屆詩經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年），頁294-301。
- 陳桐生：〈論「四始」——經學與中國古代文論範疇系列研究之一〉，《孔孟月刊》第39卷第5期（2001年1月），頁1-12。
- 賀廣如：《魏默深思想探究——以傳統經典的詮說為討論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99年）。
- 黃瑞云：〈鹿鳴之什詩義管窺〉，《湖北師範學院學報》1985年第1期，頁58-63、70。
- 黃懷信：〈《孔叢子》的時代與作者〉，收入黃懷信、李景明主編：《儒家文獻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4年），頁317-330。
- 虞萬里：《上博館藏楚竹書《緇衣》綜合研究》（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9年）。
- 虞萬里：〈以丁晏《尚書餘論》為中心看王肅偽造《古文尚書傳》說——從肯定要否定後之思考〉，《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37期（2010年9月），頁131-152。
- 趙璧光：〈小雅興義述——鹿鳴之什興四篇〉，《孔孟學報》第35期（1978年4月），頁115-133。
- 劉挺頌：〈試析《毛詩正義》對「四始」「六義」的再闡釋〉，《銅仁學院學報》第12卷第2期（2010年3月），頁20-24。

劉操南：〈《詩·小雅·鹿鳴》三篇闡義〉，《杭州師範學院學報》第2期（1991年3月），頁14-18。

鄧慶紅：〈《詩經·小雅·鹿鳴》的主題及成詩時間〉，《深圳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4卷第3期（2005年），頁63-66。

On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bout “Lu Ming” in “Si Shi” in Han Dynasty

Huang, Yu-Hsuan

Ph.D. Candidate,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d the two different comments on “Lu Ming”, reinterpreting the meaning of “Si Shi” in “Shi Ji Confucius Shi Jia”. First, the paper tried to differentiate the annotations in “Shi Xu” and “Shi Ji” respectively, proposing that Mao and Cheng followed Confucius’ explanation and focused on the positive meaning of “Shi”; on the contrary, Shi Ma Qian adopted the negative concept, arguing that “Shi” described the decaying of Zhou dynasty. From Mao and Cheng’s view, “Shi” served the purpose of being the principl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mperor and his ministers and educating the public; whereas Shi Ma Qian introduced an ironic tone to depict the rot of Zhou dynasty. Therefore, as quoted in “Confucius Shi Jia”, the “Shi” in “Feng”, “Xiao Ya”, “Da Ya”, and “Song” are as follows “Guan Ju”, “Lu Ming”, “Wen Wang”, and “Qing Miao”. As proposed above, two different approaches were adopted to interpret the four “Shi”. Confucius argued that the four works are used to emphasize the good part of human nature and have a positive meaning; by contrast, Shi Ma Qian introduced an ironic tone for analyzing the works.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lies in offering two different views toward the study of “Si Shi”.

Keywords: “Lu Ming”, Si Shi, Shi Ma-Qian, Confucius, “Xiao Ya”